

是有充分理由的。

利用石核上的石片疤相交的稜脊作为着锤点进行打片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在不同时期亦有所不同。早在 1956 年贾兰坡就已指出北京人遗址发现有这类标本，他主张“已知利用具有稜角的台面打下较适用的石片来，就是一种比较有进步的性质”。但张森水(1962)则认为：“从台面稜角上打下石片，不能解释为是中国猿人石器中的一种进步技术”。贾兰坡答辩说：“我认为利用稜角打击石片是后来(旧石器时代中期)修理台面的基础，也可以说是修理台面的孕育阶段”。根据裴文中等(1985)的统计，北京人遗址发现的有脊台面的锤击石片共 49 件，约占总数(1231)的 4%，分别发现于 1—3 层(17 件)、4—5 层(10 件)、QII(4 件)、8—9 层(5 件)、10 层(1 件)、L3(5 件)，层位不清的 7 件。裴文中等(1985)认为：“有台面脊石片，多数台面上有一条纵脊，少数有两条纵脊或更多的脊，但多汇于台面前缘的一点上，打击点多落在纵脊的前缘点上。这些标本与欧洲典型的修理台面石片相比是很相像的，因之，可以作为修理台面存在的证据，与石核中存在三件有修理台面的标本起着互为印证的作用，但是，由于其数量不多，表明修理台面工艺在用锤击法打片中所起的作用是微弱的，起主导作用的仍是原始的不修理者”。

北京人地点有脊台面石片的存在是已为众多学者接受的事实，那么匭河地点有无这类标本是很关键的问题。据贾兰坡等(1962)的报道，在匭河 66 件石片中没有发现有脊台面，他们把这一现象作为确定匭河石制品比北京人者原始的依据之一。粗看起来，贾兰坡等的判断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得出不同的看法。在《匭河》报告中，图版 VIII 图 2 所示之 P. 2481 号标本(采自西阳 6061 地点)，是一“打制台面”的石核，根据图版可以看出，至少有三块石片是以台面的稜脊为着锤点进行打片的(图 1)。其余标本无需进一步观察，仅此一例就可推测：匭河地点应当存在有脊台面的石片，它在石片中所占的比例大致和北京人地点发现者相当或稍高。这三件有脊台面的石片虽然没有在发掘时找到，但在考虑问题时可以估算进去。这样，匭河石片总数为 69 件，而有脊台面的石片占总数的 4.35%。由此看来，匭河石制品的主人也已懂得了利用石核上的石片疤相交的稜脊作为着锤点进行打片，由这一点可进一步推论，在打片技术方面，他们和北京人不相上下，具有同样的或近似的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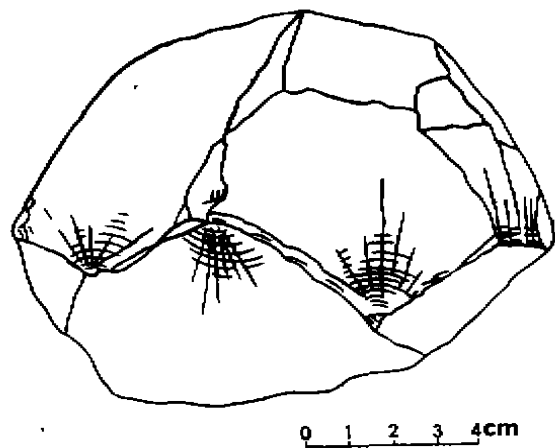


图 1 匭河 6061 地点发现的石核  
(依贾兰坡等, 1962)

A nucleus from Locality 6061 at  
Kehe after Jia Lanpo et al., 1962)

## 2. 关于石片的背面

在比较匭河和北京人的打片技术时，除了讨论台面的性质外，石片的背面也被贾兰坡等注意到了。他们指出，匭河石片的“台面和背面也多保存着砾石面”，而北京人石制品中“有许多由石核上打击下来的石片的背面上也具有石片疤痕”。在裴文中、邱

中郎、张森水的讨论文章中并没有对石片背面的情况作评论。在裴文中等(1985)的专著中,仅提到“石片背面多不保留自然面,亦有少许石片背面均为自然面或大部是者”,似乎双方都具有相同的看法。本文作者对匭河石片背面多保留砾石面存在一定的疑问。

在《匭河》专著中,收入图版的石制品共33件,其中石核10件、石片11件、石器12件。根据图版和描述可知,在11件石片中最少有9件标本背面具石片疤,而12件石器中,除石核石器和石球情况比较特殊外,全部石片石器标本背面都具石片疤。再看看石核,情况也很明显;10件石核中最少有9件标本的剥片面不是单一的疤,而是由几块石片疤构成,石片疤之间互相叠压或打破,说明打下来的石片的背面多具石片疤。由图版和描述所显示的标本看来,33件标本中最少有25件是有利于证明石片背面多具石片疤的。当然,这33件标本不能代表余下的105件标本,它们的情况可能差不多,也可能不一样。要用这33件标本来对匭河石片背面的情况下结论是不适宜的,只有对全部标本观察后才能作出比较客观的判断;在分析石片背面的同时应注意分析石核剥片面的情况。

石片的背面无非三种东西:石皮、石片疤和背脊。但这三种东西的多少,它们的组合、位置、关系却成为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过去我国学者对背面的情况研究较少,近来王建、王益人(1988)对石片背脊的分析和蔡回阳(1989)对石片背面的石片疤的分析都具有深刻的意义,必将影响到我国学者今后对石片的研究。那么石皮、石片疤和背脊三者的关系和技术的进步有什么关系呢?一般说来,任何时候打片,最初产生的石片背面都是由石皮构成的;如果在一个台面连续打片,则前一个石片疤就有可能成为后来的石片背面的一部分,这后一石片背面的侧面就具有了石片疤;如果在同一台面同一侧不断打片,在该石核的一侧完全形成由几块石片疤构成的剥片面后,再打下来的石片背面全由石片疤及背脊组成。改变打片的位置,新的剥片面若和原有剥片面相同,则石片背面同样具有疤和脊,但疤和脊的方向、位置和利用原来的台面打下的石片背面看到的不同。根据石片背面的石片疤和背脊的位置和方向及关系,可以推断该石片剥落之前石核大致的利用情况。石片背面全为石皮和背面具有石片疤两种状态,并不一定代表技术原始与进步两种类型,它们是连续打片过程的必然产物。很难设想,在有适于打片的材料没有被充分利用之前,仅仅打下一块石片就停止工作了。一般说来,代表进步技术的石片背面的疤和脊,形状较为规则,而往往是和形状规则的定型的石片相联系的。从这一观点出发,本文作者认为,即使匭河的石片背面具砾石面的,按比例要比北京人者高,也不足以证明匭河的打片技术比北京人者原始。

### 3. 关于石器的类型和加工技术

贾兰坡等认为,匭河的石器“比中国猿人者较为原始。”邱中郎则持不同意见。贾兰坡强调指出:“我们之所以说匭河者比中国猿人者原始,并非拘于类型上,主要在于加工是否精细和类型是否复杂。应该说,类型的差异虽在说明垂直(时间)的关系上也会起一定的作用,但它起显著作用的还是在于横(空间)的关系上。说明进步与否,应该详细观察和分析类型的复杂和加工的性质”。这是很精辟的见解。我们主张,在确定旧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文化遗物的总性质时,首先应当详细深入研究全部发现物的技术、类型特征,然后进行分析代表不同技术和类型的标本所占的比例,探讨工艺过程和特点,进而归纳其一

般性质和文化特征。我国好多专家都是这样做的。由于遗址保存不佳，或发现的标本有限，有些地点的材料并没有完全这样处理，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允许的。贾兰坡提到的中国猿人石器具有进步性质是对的。不过在和匭河石器对比时，有两点是值得提出来请大家注意：一是原料的差别，二是石器数量的悬殊。

北京人石器中，有一些标本加工得较为精致，多为燧石制成者。匭河的石器大多数是石英岩制成的，这种“岩石的硬度大，韧性强”，要修整出边缘平齐、美观的石器来确非易事。但《匭河》报告中提到，p. 2448 号标本为一刮削器，“在石片的尾端”（即与台面相对的一端）已修整成平直的刃口”（第 30 页）；对 p. 2456 号小尖状器的加工技术的评价为：“总之，我们应该把它看作是一种较为精致的工具”（第 31 页）。根据贾兰坡等的意见，在 19 件石器中也存在较为精致的标本。

贾兰坡（1962b）指出的北京人石器中的进步类型有：圆头刮削器和石锥。据裴文中等统计，圆端刃刮削器共 76 件，石锥 47 件，两类相加共 123 件，占石器总数的 4.15%；若加上雕刻器（113 件），则共 236 件，占总数的 7.97%。匭河的大三稜尖状器和石球为丁村重要的器物，可视作进步类型，共 4 件，而石器总数为 19 件。如果说砍斫（砸）器、刮削器和小尖状器是两地共有的类型，则圆头刮削器和石锥加上雕刻器代表北京人石器中的进步类型，虽然它们同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同类标本还有粗糙与精致之分；同样，石球和三稜大尖状器，虽然都发现于匭河、丁村（裴文中等，1958）和许家窑（贾兰坡等，1976）亦有粗糙与精致的区别。

北京人地点的石器共发现 2962 件（依裴文中等，1985），计 6 类共 30 种：刮削器 2228 件，分为 8 种（包括圆端刃刮削器，即圆头刮削器）；尖状器 406 件，分为 9 种；石锥 47 件，分为 2 种；雕刻器 113 件，分为 4 种；砍砸器 160 件，分为 6 种；球形器 8 件（一种）。北京人的石器数量不可谓不多，种类亦不可谓不复杂。匭河发现的石器（据 1962 年报告）仅有 19 件，被分为砍斫器、刮削器、三稜大尖状器、小尖状器和石球 5 类，其中砍斫器又按素材和加工情况分为 4 种。这样，19 件石器就分成 5 类 8 种，其类型亦不可谓不复杂了。如果拿现有的种类来衡量，匭河石器的种数确实要比北京人者少；但如果在匭河进一步工作，找到更多的石器，最好是找到和北京人遗址同样多的石器，类型的复杂情况是可想而知的。

总之，从打片技术和石器的加工及类型方面看来，匭河的石制品和北京人的石制品有许多共同或近似的性质，它们也有各自的特点。在可比较的项目中，匭河的石制品并不显得比北京人者原始；反过来说，北京人的石制品也不见得比匭河者进步。有些项目是无法对比的，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工作或有待更多的发现来充实，例如：争论双方都未提出有关石片背面的情况和加工精致的石器的数据，很难使人明确哪一个遗址发现的石核打片利用率的高或低，北京人制造的石器修整精致到什么程度。

（1989 年 12 月 16 日收稿）

### 参 考 文 献

- 王建、王益人，1988。石片形制探究——旧石器研究的一种新的理论和方法。考古与文物，（4）：12—30。  
李炎贤，1984。关于石片台面的分类。人类学学报，3：253—258。

- 邱中郎, 1962. 涇河文化遗址的时代问题。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6: 291—294。
- 邱占祥、黄为龙、郭志慧, 1987. 中国的三趾马化石。中国古生物志, 总号 175 册, 新丙种第 25 号。科学出版社。
- 张森水, 1962. 对中国猿人石器性质的一些认识。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6: 270—279。
- 张森水, 1989. 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中国远古人类, 97—138, 科学出版社。
- 周明镇, 1965. 蓝田猿人动物群的性质和时代。科学通报, (6): 482—487。
- 周明镇、翟人杰, 1962. 云南昭通一新种剑齿象, 并讨论师氏剑齿象的分类和时代。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6: 138—147。
- 贾兰坡, 1956. 对中国猿人石器的新看法。考古通讯, (6): 1—8。
- 贾兰坡, 1962 a. 中国猿人不是最原始的人——再与裴文中先生商榷。新建设, (7)。
- 贾兰坡, 1962 b. 和邱中郎同志讨论涇河文化遗址的时代。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6: 295—297。
- 贾兰坡, 1982. 中国的旧石器时代。科学, (7): 1—12。
- 贾兰坡, 1984. 贾兰坡旧石器时代考古论文选。文物出版社。
- 贾兰坡, 1989. 中国最早的旧石器时代文化。中国远古人类, 81—96。科学出版社。
- 贾兰坡、王择义、王建, 1961 a. 山西芮城涇河旧石器时代初期文化遗址。考古, (8): 395—397。
- 贾兰坡、王择义、邱中郎, 1961 b. 山西旧石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甲种专刊第 4 号, 科学出版社。
- 贾兰坡、王择义、王建, 1962. 涇河——山西西南部旧石器时代初期文化遗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甲种专刊第 5 号, 科学出版社。
- 贾兰坡、卫奇, 1976. 山西省阳高县许家窑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考古学报, (2): 97—114。
- 裴文中, 1962. 中国猿人究竟是否最原始的“人”? 新建设, (4): 28—41。
- 裴文中、贾兰坡, 1958. 丁村旧石器。山西襄汾县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 97—111。科学出版社。
- 裴文中、张森水, 1985. 中国猿人石器研究。科学出版社。
- 蔡回阳, 1989. 贵州普定白岩脚洞石片的初步研究。人类学学报, 8: 335—342。

## ON THE AGE AND PRIMITIVENESS OF THE STONE ARTIFACTS FROM THE KEHE SITES

Li Yanxian

(Institute of Vertebrate Palaeontology and Paleoanthropology, Academia Sinica)

**Key words** Age; Primitiveness; Stone Artifacts; Kehe; Shanxi

### Abstract

The Kehe sites may be older than the *Sinanthropus* site, and the formers seem to be nearer to the Gongwangling site in climatic environment as viewed from mammalian faunas.

Techno-typologically the Kehe industry bears a relationship to the *Sinanthropus* one though there are some distinct differences among them. However the primitiveness of the Kehe industry is not evident.

# 对百色石器层位和时代的新认识

黄 慰 文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冷 健

(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

员 晓 枫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谢 光 茂

(广西博物馆)

**关键词** 打制石器; 砖红壤化阶地; 早更新世

## 内 容 提 要

1988年冬在百色盆地进行的发掘中,从砖红壤化阶地出土了69件石制品。这是百色地区自1973年发现旧石器以来首次获得数量较大和层位记录完备的材料。有关构造、地貌和环境等方面的分析表明:百色地区含旧石器的砖红壤化阶地的堆积时代不会晚于北京人时代早期。

广泛散布于广西百色盆地内右江沿岸高阶地表面的打制石器,由于含有较多的手斧而被看作是一种同西方早期旧石器相似的石器工业(黄慰文,1987)。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自1973年以来历次采集的数千件标本,除了少数有地层记录(李炎贤、尤玉柱,1975;广西文物工作队,1983)以外,其余几乎均采自地面或缺乏完备的地层记录。因此,对这个工业的时代也就难以恰当地判断。

1986年春本文作者等到百色考察后,曾提出过石器可能产自覆盖在砖红壤化阶地之上的第三阶地的推测,又指出后者在时代上大概同华南洞内含盐井沟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的“黄色堆积”,或华北含周口店第1地点(北京人遗址)肿骨鹿动物群的堆积相当(黄慰文等,1988)。但是,当时我们没有机会通过发掘来检验上述推测。

1988年冬,我们再次到百色盆地考察,主要目的是通过发掘获得更多的石器层位的确实证据并为解决石器工业的时代问题打下基础。本文就是这次发掘<sup>1)</sup>的初步研究,着重讨论其时代。

1) 发掘于11月进行,田东县博物馆陈其复馆长也参加了工作。

## 一、地质、地理概况

百色盆地位于中国大陆南隅,属两广丘陵区(23°30'—60'N, 106°30'—107°30'E),西侧连接云贵高原,南面邻近中南半岛(又称印度支那半岛)。盆地呈北西—南东走向,长约90多公里(自百色市附近至思林附近),宽约15公里,面积约800平方公里。西江最大支流郁江两个主源之一的右江,由云南入境后顺长轴穿越盆地并在南宁附近与左江汇成郁江(从汇合点至横县的河段又称邕江(图1)。本区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夏季长而炎热,干湿季节明显。盆地西部和北部为中、下三叠系砂页岩构成的低山丘陵,东部和南部为上古生界石灰岩峰林、洼地和谷地。盆地内沉积了下第三系湖相含煤砂岩、砂质泥岩和泥岩,厚达3000米以上。在此基础之上,第四纪以来发育了一系列河流堆积和地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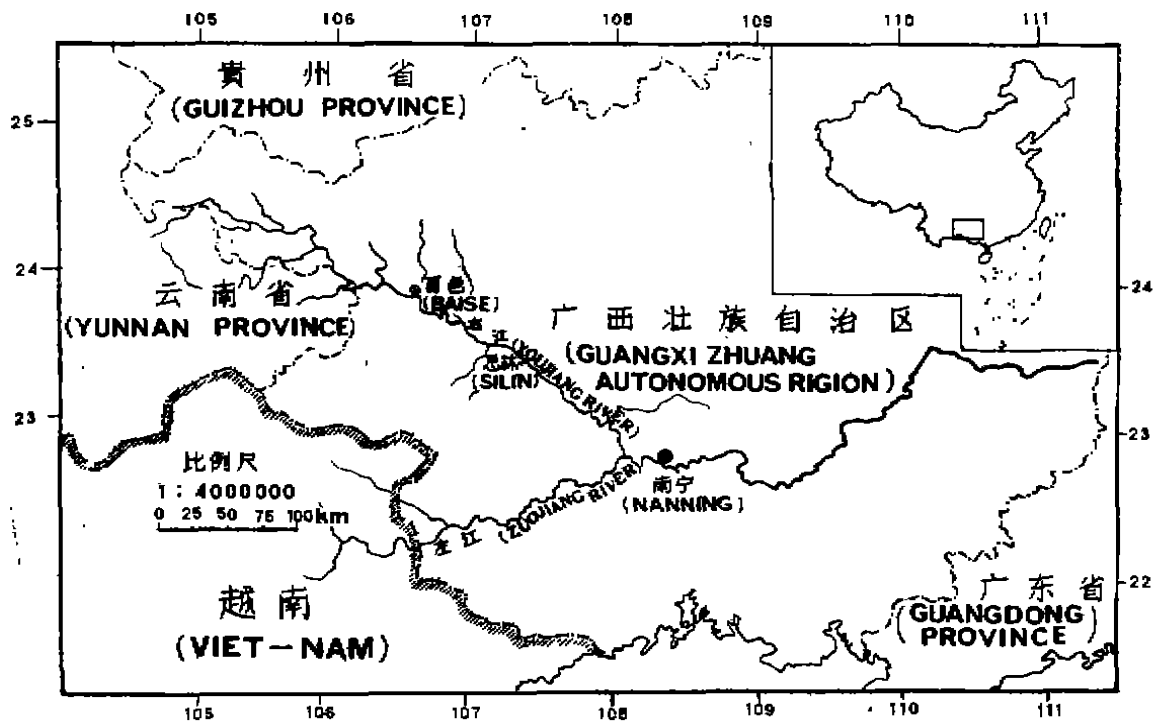


图1 百色地理位置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Baize)

右江沿岸一般可见三级阶地。它们的阶地面在地盆中心一般分别高出河面10—15米、24—34米和50—70米。此外,在一些地方,如新洲煤矿附近的公蛇岭顶部,在50—70米阶地之上覆盖有一个厚约2米的结构松散砾石层。它代表时代较晚的阶地。因此,在我们建立的右江阶地序列中,将它定为T3,而将压在它下面的、50—70米阶地定为T4,性质为埋藏阶地(黄慰文等,1988)。在这个阶地序列中,T4占有关键地位。它不仅是整个序列中厚度最大(砾石层厚可达13米,其上的粉砂、砂质粘土和粘土层可达10米)、面积最广的阶地,而且具有典型的河流堆积的二元结构。砾石的分选性和磨圆度很好,一